

# 社会保障支出、收入差距与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

左孝凡<sup>1</sup>,王翊嘉<sup>2</sup>,陆继霞<sup>1</sup>

(1.中国农业大学 人文与发展学院,北京 100083;2.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070)

**摘要:**文章基于2010—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数据,实证研究社会保障支出、收入差距对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中国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逐年下降,但在区域分布上存在一定差异性;社会保障支出降低了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但并未发挥明显的“益贫性”;收入差距作为中介变量在社会保障支出对贫困脆弱性影响过程中发挥不完全中介效应。为此提出了促进社会保障支出向贫困地区倾斜,充分发挥社会保障扶贫的“兜底”作用以及不断缩小收入差距,为我国扶贫效果的可持续提供助力等建议。

**关键词:**精准扶贫;社会保障支出;贫困脆弱性;农村居民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487(2020)15-0084-05

## 0 引言

贫困是世界范围内困扰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阻碍。世界各国在反贫困事业上都做出巨大的努力。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随着“精准扶贫”政策的不断推进,我国在反贫困事业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鉴于社会保障具有调节分配的功能,通过社会保障支出视角研究缩小地区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从而来缓解农村地区居民的贫困是一个较为恰当的切入点。

收入差距对贫困发生率的提高具有推进作用<sup>[1]</sup>,于是,缓解收入差距成为反贫困的重要路径<sup>[2]</sup>。首先,社会保障是缓解贫困的基础保障,在扶贫工作中具有“兜底”作用,积极创新和发展社会保障政策对反贫困具有积极意义<sup>[3]</sup>。其次,社会保障的调节分配功能对缩小收入差距、地区发展不均衡等问题具有重要的作用。通过加大社会保障支出可以缩小收入差距<sup>[4]</sup>,进而提高低收入居民群体的收入,但社会保障支出总量增长幅度在城乡之间分配存在差异,更多地倾向于城镇而非农村地区<sup>[5]</sup>,即社会保障支出具有城市偏好,对农村地区的投入偏低,这将导致社会保障支出出现反向调节效应<sup>[6]</sup>。收入差距不仅体现在城乡差异之间,还体现在农村内部。社会资本、金融负债、收入差距等都会提高农户的收入差距<sup>[7]</sup>。地区经济不均衡发展不仅会带来收入差距,还会进一步恶化教育资源、医疗资源不均衡的现象<sup>[8]</sup>,阻碍农村居民实现脱贫。

本文借助CFPS微观调查数据实证检验社会保障支出、收入差距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并建立“社会保障支出—收入差距—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的解释路径。就现有

文献而言存在如下改进:第一,以贫困脆弱性为贫困的代理变量考察农村居民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并将多维贫困指标纳入贫困脆弱性测量的特征变量,进一步完善贫困脆弱性特征变量指标;第二,采用中介变量检验模型回答收入差距是社会保障支出缓解农村居民贫困的作用机制之一;第三,通过构建分位数回归模型检验社会保障支出是否具有“益贫性”。

## 1 数据与方法

### 1.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两方面:社会保障支出相关数据来源于2011—2017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统计年鉴》,主要获取数据包含了省级层面的社会保障支出、卫生支出与年末总人口;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库,该调查已经完成了2010年、2012年、2014年和2016年的调查和数据汇集,涵盖了个体、家庭和社区三个层面的数据,反映中国社会、经济、人口、教育和健康的变迁。本文选取所有调查年度数据作为研究对象,考虑到数据的连贯性、可追踪性,在数据处理过程中剔除关键变量缺失的样本后对4个年度的数据进行匹配,最终形成以2010年为基期的4期平衡面板数据样本4850个,共计观测值19400个,涵盖全国24个省份。

### 1.2 变量设置

下页表1报告了本文变量设置及其释义。

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选取贫困脆弱性。贫困脆弱性表示观测样本未来落入贫困的风险,是一个取值范围为[0,1]的概率值。本文通过农村居民样本的家庭人均纯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5BSH030);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模式案例研究”项目

**作者简介:**左孝凡(1991—),男,安徽合肥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保障、发展社会学。

王翊嘉(1992—),女,河北定州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

(通讯作者)陆继霞(1977—),女,黑龙江嫩江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发展社会学。

收入建立贫困脆弱性测量模型,采用我国2010年公布的2300元/年(2010年不变价)贫困线以及世界银行的高标准贫困线3.1美元/日作为确定性等价指标,分别得出不同贫困线标准下,农村居民落入贫困的风险概率值,在测算贫困脆弱性过程中为保证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可比性,2012年、2014年和2016年均以2010年为基期按照购买力平价指数进行可比性换算。

表1 变量选取及其释义

变量		变量释义	
被解释变量	贫困脆弱性	通过贫困脆弱性测度模型测量而来,数值区间[0,1]	
	核心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	社会保障支出	通过社会保障支出、卫生支出和值与年末总人口的比值计算	
	基尼系数	通过以社区(村落)层面为群体单位,采用全部样本农村家庭的家庭人均纯收入计算基尼系数,数值区间[0,1]	
	多维贫困维度指标	教育情况	0=上过学;1=文盲或未上过学
		健康情况	0=健康;1=不健康
		用水情况	是否使用自来水、矿泉水或纯进水,0=是;1=否
		燃料使用	是否燃料使用柴草、煤炭等非清洁能源,0=是;1=否
		通电情况	0=通电;1=不通电或经常断电
		卫生设施	是否使用冲水式厕所,0=是;1=否
		垃圾处理	家庭垃圾是否通过公共垃圾桶/箱、楼房垃圾道或专人收集,0=是;1=否
		家庭资产	家中是否有汽车或拖拉机,并至多有摩托车或电视机,0=是;1=否
生活满意度		0=满意;1=不满意	
未来信息度	0=有信心;1=没信心		
控制变量	社会公平感	是否遭遇不公平的对待,0=没有;1=有	
	个体层面	性别	0=女性;1=男性
		政治身份	是否为中共党员,0=否;1=是
		社会地位	采用5分量表,1表示社会地位高,5表示低
		工作情况	是否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企单位工作,0=否;1=是
	家庭层面	婚姻情况	是否在婚,0=否;1=是
		家庭规模	家庭(同灶吃饭)人数/人
		医疗支出	家庭过去一年医疗支出/元
	社区层面	距离县城距离	所在村庄距离县城的距离/千米
		村人均收入	所在村庄人均收入/元

核心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为社会保障支出和收入差距。为了充分反映社会保障支出发挥的作用,本文通过《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统计年鉴》获取省级层面“社会保障就业支出”与“卫生支出”两项加总后与年末总人口的比值,即人均社会保障支出。收入差距采用社区(村落)层面的基尼系数作为代理变量,基尼系数衡量地区收入差距,其数值取值范围为[0,1],基尼系数越大,表示不平等程度越高,本文通过以社区(村落)层面为群体单位,采用农村家庭的家庭人均纯收入计算基尼系数。

控制变量。控制变量分为多维贫困维度指标、个体层面、家庭层面和社区层面。多维贫困维度指标主要参考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s)对多维贫困进行测量的指标选取,设置了教育、健康、生活条件以及心理主观状况等指标,并控制了一些个体、家庭和社区特征变量。同时,在模型中以东北部为参照设置了是否为东部、是否为中部、是否为西部等地区控制变量,以降低地区差异、遗漏变量等

带来的误差。

下页表2报告了变量基本描述统计情况。

1.3 计量策略

1.3.1 贫困脆弱性的测量

本文选用现阶段被学界广泛运用贫困期望的脆弱性(VEP)<sup>[9]</sup>,通过个体目前所具有的个体、家庭、社区特征以及生活条件等特征变量预测居民未来陷入贫困的可能性。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公式(1)展示了VEP的数理含义,即农村居民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式中 $VUL_{it}$ 表示的第*i*个农村居民*t*时期的脆弱性, $Y_{i,t+1}$ 表示第*i*个农户*t+1*时期的家庭人均纯收入水平,其中, $i=1,2,\dots,4850$ , $Z$ 表示确定性等价指标,即贫困线标准; $Pr$ 为概率符号。

$$VUL_{it} = Pr(Y_{i,t+1} \leq Z) \quad (1)$$

第二步,采用可行最小二乘法(FGLS),构建方程如公式(2)所示,其中, $\ln Y_i$ 表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对数形式, $X_{ri}$ 表示多维贫困指标、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社区特征变量, $\beta_r$ 表示各特征变量的待估计参数, $\beta_0$ 为常数项,其中 $r=1,2,\dots,23$ 。 $\varepsilon_i$ 表示随机误差项,获得拟合值及残差平方 $\sigma_{e,i}$ 。

$$\ln Y_i = \beta_0 + \beta_r X_{ri} + \varepsilon_i \quad (2)$$

第三步,计算期望值 $E(\ln Y_i|X_{ri})$ 和方差 $V(\ln Y_i|X_{ri})$ 。如公式(3)和公式(4)所示,其中 $\beta_{FGLS}$ 与 $\rho_{FGLS}$ 表示拟合值。

$$E(\ln Y_i|X_{ri}) = \beta_{FGLS} X_{ri} \quad (3)$$

$$V(\ln Y_i|X_{ri}) = \rho_{FGLS} X_{ri} \quad (4)$$

第四步,将上述计算结果代入公式(1),结果如公式(5)所示。其中 $\ln poor$ 表示确定性等价指标,即贫困线的对数值, $\Phi$ 表示将结果正态化。

$$VUL_{it} = \Phi \left( \frac{\ln poor - E(\ln Y_i|X_{ri})}{\sqrt{V(\ln Y_i|X_{ri})}} \right) \quad (5)$$

1.3.2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在采用FGLS建立贫困脆弱性测量模型后,本文还需采用计量模型研究社会保障支出、收入差距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模型。进一步构建面板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并采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研究社会保障支出对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公式(6)展示了方程形式,其中 $VUL_{it}$ 表示第*i*个样本在*t*时期的贫困脆弱性, $SSE_{it}$ 表示第*i*个样本在*t*时期的社会保障支出, $X_{rit}$ 分别表示样本*i*在*t*时期第*r*个控制变量,其中 $r=1,2,\dots,23$ 。 $\alpha_0$ 为常数项, $\alpha_1$ 、 $\alpha_{2r}$ 表示社会保障支出、控制变量的待估计参数, $\varepsilon_2$ 为随机误差项。

$$VUL_{it} = \alpha_0 + \alpha_1 SSE_{it} + \alpha_{2r} X_{rit} + \varepsilon_2 \quad (6)$$

1.4 研究假设

社会保障可以通过提高家庭收入、提高健康水平、提高幸福感等方面从经济、健康、精神等方面消除贫困<sup>[10]</sup>,同时社会保障支出还关注到了教育方面。社会保障支出通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2010年		2012年		2014年		2016年			
	均值	标准误	均值	标准误	均值	标准误	均值	标准误		
被解释变量	贫困脆弱性1	0.474	0.020	0.465	0.016	0.457	0.014	0.457	0.016	
	贫困脆弱性2	0.498	0.021	0.488	0.017	0.480	0.015	0.480	0.017	
核心解释变量	社会保障支出	0.105	0.032	0.144	0.037	0.188	0.045	0.242	0.060	
	基尼系数	0.372	0.094	0.42	0.096	0.407	0.087	0.400	0.120	
控制变量	多维贫困维度指标	教育情况	0.357	0.479	0.232	0.422	0.283	0.450	0.393	0.488
		健康情况	0.557	0.497	0.746	0.435	0.872	0.335	0.878	0.327
		用水情况	0.627	0.484	0.561	0.496	0.481	0.500	0.414	0.493
		燃料使用	0.307	0.461	0.438	0.496	0.464	0.499	0.500	0.500
		通电情况	0.039	0.193	0.035	0.183	0.029	0.167	0.029	0.167
		卫生设施	0.818	0.386	0.794	0.404	0.773	0.419	0.773	0.419
		垃圾处理	0.848	0.359	0.787	0.409	0.653	0.476	0.653	0.476
		家庭资产	0.293	0.455	0.654	0.476	0.611	0.488	0.431	0.495
	个体层面	生活满意度	0.138	0.345	0.171	0.377	0.079	0.269	0.120	0.325
		未来信息度	0.128	0.334	0.142	0.349	0.075	0.263	0.094	0.292
		社会公平感	0.272	0.445	0.177	0.381	0.222	0.416	0.222	0.415
		性别	0.478	0.500	0.478	0.500	0.478	0.500	0.478	0.500
	家庭层面	是否为党员	0.059	0.236	0.065	0.246	0.068	0.253	0.072	0.258
		工作情况	0.030	0.170	0.048	0.214	0.009	0.096	0.007	0.083
社会地位		0.258	0.438	0.339	0.473	0.202	0.402	0.247	0.432	
社区层面	婚姻情况	0.920	0.271	0.920	0.271	0.919	0.273	0.913	0.282	
	医疗支出	3383.162	10682.48	3760.621	13906.44	4516.845	11223.24	5629.872	16890.94	
	家庭规模	4.495	1.718	4.525	1.797	4.442	1.792	4.414	1.888	
社区层面	距离县城距离	27.209	21.507	27.209	21.507	24.204	19.396	24.204	19.396	
	村人均收入	3146.202	2259.771	3146.202	2259.771	5442.269	4740.419	5442.269	4740.419	

注:贫困脆弱性1和贫困脆弱性2分别表示在国家贫困线2300元/年(2010年不变价)和世界银行高贫困线3.1美元/日不同标准下的测算结果;村人均收入由于数据缺失,2012年沿用2010年数据,2016年沿用2014年数据。

过直接、间接转移支付保证居民的最低生活标准所需要的必须支出,通过完善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包括城乡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完善教育制度改革,实现义务教育的全覆盖和各类教育资助贷体制;同时通过提高农村居民的社会公平感、未来信心度、生活满意度进一步提高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即从经济、健康、教育、精神四个方面促进农村居民脱贫。故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社会保障具有扶贫的兜底作用,降低农村居民落入贫困和再次落入贫困的风险。

收入差距是经济发展带来的产物,大部分的实践情况不具备“涓滴效应”,即随着经济的发展财富不会从高收入群体向低收入群体扩散。收入差距与教育不平等存在恶性循环,教育不平等扩大收入差距的同时,收入差距对教育不平等产生负向影响<sup>[4]</sup>,进而影响到居民的贫困状态。收入差距也带来医疗资源的不平等<sup>[7]</sup>,加剧了农村居民“因病致贫”的风险。故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收入差距不利于农村居民脱贫,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会进一步加深农村居民贫困程度。

假设3:社会保障支出通过缩小收入差距进而降低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

## 2 实证检验

### 2.1 贫困脆弱性测量结果分析

表3报告了不同年份的贫困脆弱性测量结果。从时间序列来看,贫困发生率从2010—2014年逐年下降,虽然在2016年有小幅上升,但不影响贫困发生率的下降趋

势。再观察到各年度的贫困脆弱性平均值,农村居民落入贫困的风险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说明随着我国扶贫事业的推进,农村居民在教育、医疗、农村生活条件、心理信心等方面的改善有一定进展,提高了农村居民抗击外来风险的能力进而降低其落入贫困的概率。从不同贫困标准来看,随着贫困标准的提高,贫困发生率和贫困脆弱性平均值均有一定程度上升,其中贫困标准提升导致2016年贫困发生率上升了61%,说明我国贫困群体收入水平与贫困线之间的收入缺口较大,贫困深度较高。

进一步讨论贫困脆弱性在不同区域上的差异性。表4报告了贫困脆弱性在不同区域、不同年份的分布情况。从不同区域来看,除2012年外,西部、东北地区的贫困脆弱性的均值均处于较高水平,而中东部地区贫困脆弱性均值较低,整体上符合我国东部经济发展较好,其他地区发展相对落后的现实情况;从不同年份来看,贫困脆弱性的整体趋势是逐年下降的,比较以国家贫困线为标准的2010年与2016年的测量结果,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贫困脆弱性

分别下降5.79%、5.68%、3.85%、2.77%,全国平均下降幅度为5.49%;从不同贫困标准角度来看,随着贫困线标准的提升,不同地区贫困脆弱性的增长幅度存在一定差异,说明处于贫困线以下的贫困人口与贫困线收入之间的差距存在一定差异,即收入缺口存在差异,反映了不同地区贫困深度具有差异性。

表3 不同年份贫困发生率与贫困脆弱性平均值

年份	2300元/年		3.1美元/日	
	贫困发生率	脆弱性平均值	贫困发生率	脆弱性平均值
2010	0.217	0.473	0.418	0.497
2012	0.195	0.465	0.304	0.488
2014	0.170	0.451	0.268	0.474
2016	0.176	0.447	0.285	0.469

表4 贫困脆弱性在不同区域、不同年份的分布情况

地区	样本数	2010年		2012年		2014年		2016年	
		Vul1	Vul2	Vul1	Vul2	Vul1	Vul2	Vul1	Vul2
东部	1214	0.466	0.488	0.466	0.489	0.448	0.470	0.439	0.460
中部	1409	0.475	0.499	0.475	0.499	0.426	0.447	0.448	0.470
西部	1529	0.481	0.506	0.472	0.496	0.464	0.487	0.461	0.484
东北	698	0.469	0.492	0.462	0.485	0.464	0.487	0.456	0.478
总计/平均	4850	0.473	0.497	0.465	0.488	0.451	0.474	0.447	0.469

注:Vul1和Vul2分别表示在2300元/年、3.1美元/日贫困标准下测量的贫困脆弱性,下表同。

### 2.2 社会保障支出对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影响结果分析

下页表5报告了社会保障支出对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影响的回归模型结果。模型1和模型2采用了固定效应模型,模型3和模型4采用了随机效应模型。模型1与模型3采用2300元/年标准下的贫困脆弱性,模型2与模型4采用3.1美元/日的标准下的贫困脆弱性。模型检验结果显示,无论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在不同

贫困标准下,社会保障支出对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影响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即社会保障支出可以显著降低农村居民落入贫困的风险。假设1得到验证。

就控制变量而言,教育情况、健康情况、生活条件以及心理主观意识等方面,均可发现多维贫困维度与其落入贫困风险的脆弱性指标呈现一致性;农村地区男性落入贫困的概率要明显小于女性,这与农村地区劳动力供给结构有关,其中在政府、事业单位以及国企工作的农村居民落入贫困的概率要低于其他工作的居民;处于在婚状态的家庭、较大的家庭规模均不利于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的降低,这与农村地区组建家庭后,家庭等价劳动力降低有关,如家里存在无劳动能力的老人与孩子需要赡养与抚养;反映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农村人均收入分别在不同程度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统计检验,说明村落经济发展越好越有利于降低农村居民陷入贫困的风险;而反映农村社会发展指标的距离县城距离对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距离县城越远农村居民陷入贫困的概率越大。

表5 社会保障支出对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影响检验结果

变量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社会保障支出	-0.0267*** (0.0029)	-0.0285*** (0.0029)	-0.0315*** (0.0021)	-0.0336*** (0.002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地区控制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9400	19400	19400	19400

注:\*\*\*、\*\*、\*分别表示在1%、5%、10%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报告为标准误;控制变量检验结果略,下表同。

### 2.3 社会保障支出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机制分析

社会保障制度具有调节分配的制度,这对缓解收入差距扩大具有重要影响。根据假设3,本文通过建立“社会保障支出-收入差距-贫困脆弱性”影响传导机制,建立中介效应检验模型。在检验中介效应过程中需要考虑到三个方程,方程形式如公式(7)、公式(8)、公式(9)所示。其中  $VUL_{it}$ 、 $SSE_{it}$ 、 $IncGap_{it}$ 、 $Convars_{irt}$  分别表示贫困脆弱性、政府社会保障支出、收入差距以及控制变量等。 $\varepsilon_3$ 、 $\varepsilon_4$ 、 $\varepsilon_5$  和  $\alpha$ 、 $\beta$ 、 $\delta$  分别表示三个方程的随机误差项和系数。

$$VUL_{it} = \gamma_0 + \gamma_1 SSE_{it} + \gamma_2 Convars_{irt} + \varepsilon_3 \quad (7)$$

$$IncGap_{it} = \pi_0 + \pi_1 SSE_{it} + \pi_2 Convars_{irt} + \varepsilon_4 \quad (8)$$

$$VUL_{it} = \delta_0 + \delta_1 SSE_{it} + \delta_2 IncGap_{it} + \delta_3 Convars_{irt} + \varepsilon_5 \quad (9)$$

表6报告了收入差距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方程1、方程2与方程3均采用了固定效应模型。检验收入差距是否具有中介效应需要通过以下三个步骤:

第一步,检验系数  $\gamma_1$  是否显著,通过表6中方程1检验结果所示,无论在何种贫困标准下,社会保障支出均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负向影响贫困脆弱性,即社会保障支出的提高将有利于农村居民降低未来陷入贫困的风险。故通过第一步检验。

第二步,检验方程2和方程3检验结果中的系数  $\pi_1$  和  $\delta_2$ 。表6中方程2与方程3检验结果显示。方程2检验结果显示社会保障支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基尼系数具有显

著的负向影响,即社会保障支出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方程3检验结果显示,基尼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贫困脆弱性具有正向影响,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农村居民未来落入贫困的概率将会提高,在纳入基尼系数以后,社会保障支出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仍然显著。故通过第二步检验。

第三步,由第二步结果  $\pi_1$  和  $\delta_2$  全部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则第三步选择上分支,即检验系数  $\delta_1$  是否显著。由表6中方程2与方程3检验结果显示,社会保障支出在模型方程中在1%的统计水平下对贫困脆弱性有显著影响。所以,收入差距发挥不完全中介效应。假设2和假设3得到验证。

表6 收入差距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固定效应模型	方程1		方程2	方程3	
	Vul1	Vul2	基尼系数	Vul1	Vul2
社会保障支出	-0.0451*** (0.0026)	-0.0481*** (0.0028)	-0.0903*** (0.0240)	-0.0261*** (0.0029)	-0.0279*** (0.0031)
基尼系数	—	—	—	0.0069*** (0.0010)	0.0074*** (0.001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区域控制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9400	19400	19400	19400	19400

### 2.4 社会保障支出“益贫”偏好分析

基于上述分析,社会保障支出确实可以通过缩小收入差距发挥减贫作用,而现有研究发现社会保障支出具有明显的城市偏好。本文进一步分析在农村地区社会保障支出是否具有贫困群体偏好,即是否具有“益贫性”的问题。通过构建混合截面分位数回归模型,检验社会保障支出对不同贫困脆弱性程度的农村居民产生的差异性影响。为了保证结果的可靠性,对分位数回归模型进行500次反复抽样的稳健性操作。表7报告了不同贫困标准下社会保障支出、基尼系数对贫困脆弱性的分位数回归模型检验结果,将社会保障支出与基尼系数纳入模型当中。在不同贫困标准下,任何分位数回归模型下均得出社会保障支出具有减贫效应,进一步检验了社会保障支出可以降低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结论的稳健性。同样的,基尼系数在两种贫困线标准、不同分位数下均呈现对农村贫困脆弱性具有负向影响,收入差距的扩大会提高农村居民落入贫困的风险。

表7 分位数回归模型检验结果

贫困线	变量	分位数回归模型				
		q10	q25	q50	q75	q90
2300元/年	社会保障支出	-0.0302*** (0.0057)	-0.0559*** (0.0035)	-0.0559*** (0.0025)	-0.0427*** (0.0026)	-0.0292*** (0.0022)
	基尼系数	0.0096*** (0.0019)	0.0084*** (0.0010)	-0.0061*** (0.0007)	0.0045*** (0.0007)	0.0041*** (0.000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区域控制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9400	19400	19400	19400	19400
3.1美元/日	社会保障支出	-0.0316*** (0.0063)	-0.0598*** (0.0035)	-0.0596*** (0.0027)	-0.0455*** (0.0028)	-0.0313*** (0.0024)
	基尼系数	0.0103*** (0.0019)	0.0090*** (0.0011)	0.00653*** (0.0008)	0.0049*** (0.0008)	0.0043*** (0.000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区域控制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9400	19400	19400	19400	19400

为了更加直观展现社会保障支出是否具有“益贫性”，基于社会保障支出对贫困脆弱性影响的分位数回归结果绘制折线图。图1报告了不同分位数社会保障支出对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的减贫效应。纵轴表示社会保障支出对贫困脆弱性影响系数，横轴表示分位数。图中阴影部分为95%置信区间的上下区间值绘制。图1(a)和图1(b)分别表示在2300元贫困线标准和3.1美元/日的贫困标准下不同分位数的社会保障对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影响系数。整体上两图在趋势上保持一致。具体而言，在50%分位数前，社会保障支出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随着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水平越高对其影响程度越大(边际效应递增)，社会保障支出更多地作用到收入相对较低的农村居民群体，呈现一定的“益贫性”。但在后50%分位数后，社会保障支出对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影响在曲线上呈现上升态势(边际效应递减)，说明社会保障支出并没有对极端贫困的农村居民有明显的偏好。在2300元/年贫困标准下，处于10%分位点和90%分位点社会保障支出对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影响系数分别为0.0302和0.0292，比较而言并没有发现社会保障支出更加倾向极端贫困群体。所以，社会保障支出在整体上并没有“益贫性”，而是在对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的25%分位数点对贫困脆弱性影响具有最大的边际效应，在该分位点上两种贫困标准下社会保障支出每增加1个单位农村居民贫困落入贫困的风险概率分别下降5.59%和5.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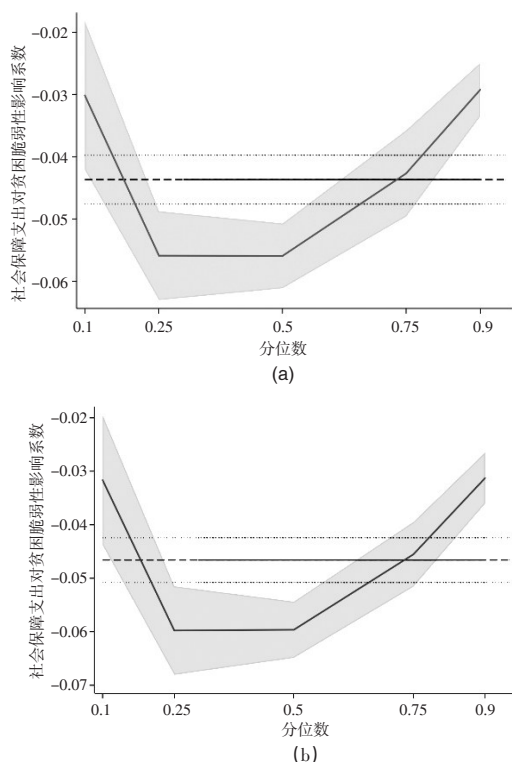


图1 社会保障支出对贫困脆弱性影响系数在不同分位点的分布

### 3 结论

本文基于CFPS数据，在测算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的基础上分析了社会保障支出、收入差距对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我国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在时间序列上呈逐年下降趋势，在地理区位上呈现东中部地区较低，西部、东北地区较高的分布。随着我国经济和反贫困事业的不断发展，农村极端贫困逐年下降，但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地区发展不均衡等特征，我国农村地区贫困人口在地理分布特征上具有明显差异，整体上呈现经济发展较好的东部地区贫困脆弱性低于全国其他地区水平。

第二，社会保障支出具有重要的反贫困作用，但是没有明显的“益贫性”。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以及分位数回归模型结果显示：社会保障支出对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具有明显的改善作用，社会保障支出显著降低农村居民未来陷入贫困的风险，但社会保障支出并没有发挥明显的“益贫性”，随着农村居民贫困程度的不断加深，社会保障支出对极端贫困群体的贫困脆弱性影响的边际效应并没有明显提高。

第三，社会保障支出通过缩小收入差距缓解农村居民的贫困脆弱性，收入差距在社会保障支出对贫困脆弱性影响过程中发挥不完全中介效应。社会保障具有调节分配的重要作用，对缩小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收入差距的扩大不利于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的降低。以收入差距为中介变量建立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结果显示收入差距在社会保障支出对贫困脆弱性影响过程中发挥不完全中介效应，由此说明“社会保障支出-缩小收入差距-降低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是社会保障支出实现减贫效应的一条有效路径。

### 参考文献：

- [1]程名望, Jin Yanhong, 盖庆恩, 等.农村减贫:应该更关注教育还是健康?——基于收入增长和差距缩小双重视角的实证[J].经济研究,2014,49(11).
- [2]罗楚亮.经济增长、收入差距与农村贫困[J].经济研究,2012,47(2).
- [3]左停.贫困的多维性质与社会安全网视角下的反贫困创新[J].社会保障评论,2017,1(2).
- [4]岳希明,陈保同.重新认识政府收入再分配职能改善居民收入不平等[J].中国财政,2013,(24).
- [5]张柏伊,苏建斌.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完善对策[J].甘肃理论学刊,2015,(4).
- [6]朱德云,董迎迎.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17,(1).
- [7]程名望,史清华, Jin Yanhong, 等.农户收入差距及其根源:模型与实证[J].管理世界,2015,(7).
- [8]申云,贾晋.收入差距、社会资本与幸福感的经验研究[J].公共管理学报,2016,13(3).
- [9]Chaudhuri S, Jalan J, Suryahadi A. Assessing Household Vulnerability to Poverty From Cross-sectional Data: A Methodology and Estimates From Indonesia [J]. Discussion Papers,2002.
- [10]刘一伟.社会保障支出对居民多维贫困的影响及其机制分析[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7,(7).
- [11]吕炜,杨沫,王岩.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教育不平等与政府教育投入[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5,(3).

(责任编辑/方 思)